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動機

從筆者進入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就讀以來，對於各個民族因為自身文化的差異，而造成不同民族即使在同樣的環境之下，卻會發展出不同樣貌的多元性與複雜性相當的感興趣。其中令筆者最感興趣的就是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會產生的適應問題。

而近代的經濟學研究因為受到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亞當·史密(Adam Smith)所提出的「無形之手」論點的影響，認為以個人或個別公司為單位，在市場上進行以私人利益為依歸的競賽與交易，將可以最有效釋放經濟動力，達到社會普遍富庶的目標，也就是所謂市場的優越性。這個理論將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結合來看待經濟的發展，將社群以及一切與效率無關的文化價值觀，看成與經濟活動無關甚至是會妨礙市場運作的力量。此外，根據這種說法，政府只應負起維持法制、紀律的角色，過量的規範是有害無益的。基於上述的論點，經濟研究者將政治、文化、社會制度摒棄在經濟研究領域之邊緣位置，六〇年代以來，經濟學傾向於建立數學模型，將這種漠視政治、社會、文化的觀點推至高峰。¹

不過這種僵化的研究，並非一直受到普遍的認同，一些比亞當·史密(Adam Smith)稍微晚期的社會思想家，例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E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等，都曾經批判這種抽象化與非人性化的研究傾向。這些社會思想家深刻的描繪出經濟活動與文化傳統、社會制度以及政治角力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鮮明的標誌著文化、社會和政治分析對經濟生活所能夠做出的貢獻。²而筆者對於上述這種看法也有深刻的體認，筆者同樣也認為經濟發展與經濟生活，是不能單純的只從效率、資本、勞動力與利潤來做分析。因此，筆者希望嘗試著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探討經濟發展，所以在進入研究所就讀之後，就以中國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為寫作論文的方向。

從中國的整體社會環境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前，是屬於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而中國的少數民族於各方面的發展上，除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間受到較大的衝擊之外，³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決定從一九七九年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後，從此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以發展經濟為主的階段，⁴但是二

¹ 朱燕華、張維安編著，《經濟與社會－兩岸三地社會文化的分析》，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 1-2。

² 同前註，頁 5。

³ 張崇根主編，《中國民族工作歷程》，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頁 4。

⁴ 同前註，頁 100-111。

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也造成了中國東、西部社會整體發展的不均衡，使得少數民族人口居多的西部，成為中國近年來急於開發的重點地區，而解決少數民族的經濟問題，使其出貧脫困，更是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方針，因為中國政府積極的拓展經濟，使得原本封閉的少數民族地區受到外來的影響與刺激，對於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也起了不同的作用。

因為上述的原因，引起筆者撰寫有關於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之間關係論文的想法，想探討少數民族經濟在變遷下的社會文化中，到底會受到什麼影響？會產生什麼變化？而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又會因為經濟發展受到什麼樣的衝擊？以及在這樣的衝擊之下，少數民族又是如何的來面對以及適應這樣子的變遷？因為中國政府在八〇年代後，經濟制度改革的因素，使得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受到重視。穆斯林民族因為宗教與歷史發展的影響，有重視商業與經濟發展的傳統，因此筆者希望藉由觀察西北的穆斯林民族的經濟發展，並從整個社會文化的變遷中，來探討這個民族本身的文化所受到的影響與衝擊，以及與發展民族經濟之間的關係。

筆者會選擇以循化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為例子，是因為機緣巧合，在二〇〇〇年及二〇〇一年，分別參加了兩岸大學生交流與兩岸文化交流的活動，在青海停留了總計約二十天的時間，感受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發展市場經濟，對於西北穆斯林民族的影響，因為西北穆斯林民族重商的價值觀、和善於經商的傳統，與中國從改革開放後，到現在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不謀而合。會選擇以循化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為例子，則是因為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穆斯林少數民族，西元十三世紀從中亞遷居至今日的循化地區，而撒拉族在這七百年的歷史過程中，不但沒有因為其民族人口數少而被其他民族同化，還發展出獨特的民族特性，甚至改革開放之後因為興辦鄉鎮企業使得撒拉族的經濟有了發展的機會，這引起了筆者高度的興趣，進而想探究這個民族到底是因為宗教信仰的因素，還是其他特殊的原因讓撒拉族有如此堅強的韌性，能夠在青海屹立不搖。而且循化縣地處河湟，在歷史上就是各民族交會之地，是絲綢之路的孔道，有其歷史性；全國的撒拉族人口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所顯示的是 104,503 人，而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是全中國唯一的撒拉族自治縣，循化縣的總人口在二〇〇〇年的統計是 104,452 人，其中撒拉族人口有 63,859 人、藏族為 25,783 人、回族為 8,155 人、漢族為 6,217 人；從上面的數據得知，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撒拉族人口佔了全中國撒拉族人口的 61%。⁵由此可知，循化縣在民族區域自治上有其獨特性，在撒拉族人口上也有其代表性；近年來因為改革開放，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中國各地方的趨勢，而循化撒拉族的鄉鎮企業也於近年蓬勃發展，使得原本以農業為主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開始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經濟型態與特性，也因此引起了筆者探討

⁵ 人口數據是參考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人口比例為筆者參考普查資料所整理。參考：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統計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2-3。並參考：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統計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下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1186。

循化撒拉族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興趣。

二、內容架構

筆者在本篇論文的內容與切入角度上，將以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為兩大主軸，以循化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為案例，探討在社會文化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這是過去研究經濟甚至是民族經濟的研究者都不大碰觸的領域，也與一般研究鄉鎮企業的切入點有所不同。筆者所關心的問題是在於鄉鎮企業的發展，究竟除了受到一般經濟學所認為的那些指標的影響之外，民族的社會文化對於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因為筆者閱讀韋伯的著述，認為在經濟與文化之間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無法只從數據和數學模型來了解，因此本篇論文將以此觀點出發，來對撒拉族的鄉鎮企業進行分析研究。

論文共分成六章。首先在第一章緒論部分，第一節，也就是本節中會先介紹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內容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第二節會對於相關文獻做整理，並對研究概況作回顧和介紹；第三節中會對於撒拉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做一個概況介紹；第四節會解釋所研究的對象—撒拉族鄉鎮企業的概念，並就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鄉鎮企業發展歷程與背景做概況式的介紹。

在第二章中，是以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下的鄉鎮企業現象為主軸，介紹中國發展鄉鎮企業的大環境，分析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環境變遷與發展之下，鄉鎮企業是如何取得發展契機的過程與背景；並在第二節介紹甘、寧、青三省區穆斯林民族的鄉鎮企業發展的特色與其概況。畢竟，撒拉族是屬於西北甘、寧、青三省區穆斯林民族的一份子，所以在第二章中把撒拉族的定位做釐清，介紹其發展的大環境。撰寫這一章的用意，是因為循化撒拉族的鄉鎮企業，其發展與大環境的發展息息相關，闡明循化撒拉族發展鄉鎮企業並不是個特例，而是全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趨勢，但是因為撒拉族本身民族有著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特性，使得撒拉族在發展鄉鎮企業的時候，會產生出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區、民族的鄉鎮企業的文化適應問題，因為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撒拉族的社會文化產生出不同的影響和適應的現象，因而在第二章先做此背景介紹。在介紹完鄉鎮企業發展的背景後，會於第三節中介紹撒拉族鄉鎮企業目前的發展概況。

在第三章中，則會探討撒拉族信仰的伊斯蘭教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從伊斯蘭教本身的經濟思想，來分析伊斯蘭教對於撒拉族這一穆斯林民族在發展經濟的影響。試圖在這一章中探討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民族，在發展自身民族經濟的同時，是否因為宗教信仰與其他民族不同，而發展成穆斯林式特色的鄉鎮企業。並在第三節中分析探討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的時候，對於伊斯蘭教教義中所不允許的利息問題是如何的來處理與面對，以及與其他穆斯林民族的鄉鎮企業經營者的差異性以及原因，以了解在面對變遷的過程中，撒拉族的適應狀況。

在第四章中，是從撒拉族本身的社會文化發展對鄉鎮企業的影響做分析討

論。但是因為社會文化的議題相當廣泛，筆者無法對所有的議題都能進行探討，因此筆者將本論文探討的社會文化的議題，限定在宗教信仰、社會價值觀、傳統經濟生活、教育問題與婦女問題上。第三章已經針對撒拉族的宗教信仰做過討論，而第四章則是探討撒拉族的傳統社會價值觀、傳統經濟生活以及教育發展對於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這一章主要是探討撒拉族在發展本民族鄉鎮企業時，除了與其他穆斯林民族共同受到經濟發展的大環境與宗教教義影響之外，其本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對於撒拉族的鄉鎮企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五章則是從與第四章不同的角度切入，因為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是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的關係，在第四章中已經針對撒拉族本身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對發展經濟的影響做分析，因此第五章將探討經濟發展對撒拉族的社會文化的影響，探討鄉鎮企業對傳統經濟生活、教育發展以及婦女的角色所產生的影響，分析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所面臨的社會文化適應的問題。因為第三、第四章是探討宗教與社會文化對鄉鎮企業的影響，這一章要回過頭來觀察鄉鎮企業發展之後，對於撒拉族的社會文化有什麼樣的衝擊及其如何適應。

第六章，本篇論文的最後一章，是回顧以上五章的總結。並試圖從本論文所觀察到的現象與發展，並嘗試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

論文中所參考的相關文獻分成五個部分：文獻的第一部分，是對於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統計數據來做分析，企圖從整個中國發展的角度找出社會經濟變遷的脈絡。第二個部分，是有關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背景資料與研究概況。第三個部分是民族經濟方面的研究成果。第四個部分，是針對穆斯林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文獻做探討。第五個部分則是分析撒拉族的民族志資料、史料及專書。

2. 田野調查法

筆者除了分析相關文獻書面資料之外，還以青海省省會西寧市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為田野調查的地點，於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至七月三十日共十一天、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以及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共十天，前後共三次的田野調查。筆者參與當地撒拉族人的日常生活，以親身了解撒拉族人的社會文化；並針對當地撒拉族人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當地自治縣政府相關人員、撒拉族中從事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以及當地的撒拉族人做訪談，對撒拉族人經營的鄉鎮企業，

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做深入的了解。

筆者在田野調查之前就先閱讀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利於了解撒拉族的宗教信仰與日常生活情況。在田野調查期間也盡量依照伊斯蘭教的飲食習慣，並且維持每天撰寫田野日誌的習慣。並且在去做田野調查之前，就先設計好問題意識與所要訪談的對象，從不同的問題意識來衍申出訪談的問題，並且針對不同的訪談對象採用不同的問題及態度來做田野訪談。筆者在問題意識上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a. 中國經濟改革對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1949年），基本上是實行計畫經濟。直至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朝著市場化邁進。而鄉鎮企業就是在中國經濟朝向市場化改革之後，才有機會發展起來的，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議題，對於鄉鎮企業來說是一個強大的發展因素，所以把這個問題意識當成背景來理解探討。

b. 伊斯蘭教對於撒拉族經營鄉鎮企業的影響

撒拉族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是中國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⁶之一，其主要聚居區的青海省循化縣。伊斯蘭教重視商業、崇尚商人的價值觀對於穆斯林的影響可謂非常深遠，這樣重商的價值觀，也是造成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因素之一。因為撒拉族是穆斯林民族，而伊斯蘭教的價值觀，可謂是撒拉族的核心價值，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就希望能探討伊斯蘭教對於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上的影響。

c. 撒拉族社會結構與文化與鄉鎮企業發展的關係

除了伊斯蘭教對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上面有影響之外，撒拉族本身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對於鄉鎮企業發展的影響，以及在鄉鎮企業發展之後所面臨的問題適應上，也是筆者所好奇的問題。

除了筆者自己去青海做田野調查以外，筆者在二〇〇四年七月十日到七月十八日期間還跟隨張中復老師所帶領的「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學年度中國大陸西北穆斯林社會田野調查隊」，到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臨夏市做田野調查，因為筆者屬於田野調查隊中所下設的「社會經濟組」，因此是針對臨夏市的回族穆斯林企業進行調查。在這一次的田野調查過程中，主要的焦點是關注在伊斯蘭教對回族穆斯林企業經營模式所產生的影響方面，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也與筆者做論文的田野調查相同，先前做了問題意識的設計，並且針對不同的訪談對象用不同的問題意識來做訪談；不過因為這一次是做專題式的田野調查，所涉及的範圍也就在宗教對穆斯林經濟

⁶ 中國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為：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

發展的影響上，與筆者於青海所做的田野調查在議題的廣度上有所差異。但是因為有這一次臨夏州的田野調查機會，使筆者在撰寫本篇論文時，有了比較分析的實際案例。因為甘肅臨夏州與青海循化縣同屬河湟地區，所居住的又都為穆斯林民族，因此對於筆者探討宗教對於經濟發展上的影響有很大的幫助。

(二) 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有五個方面

1. 相關研究成果較少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是近二十年來的事情，中國學者對於少數民族經濟議題的研究也才剛起步，尤其是因為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撒拉族，關於撒拉族鄉鎮企業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數，台灣學界對撒拉族的研究更以本篇論文首開先河。而且過去研究者的關注焦點，多集中在撒拉族歷史與族源的發展上，因此，相關撒拉族經濟的研究也較少，這是本論文的其中一個限制。

2. 無法進行長時間持續性的田野調查

因為筆者是台灣的研究生，本身又不是穆斯林，加上經濟與時間的考量，無法長時間在中國停留做田野調查，只能從事短期的田野調查和參訪，這對本論文的研究來說，是另外一個缺憾。

3. 實證研究與相關理論的互動有待加強

筆者因為本身在經濟學以及人類學相關研究上的涉獵不足，使得筆者在撰寫本篇論文時，在論文內容呈現上較為缺少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對話，導致本論文在內容上也比較缺少與理論相關的架構性分析，這是本論文的研究限制。

4. 研究中國西北穆斯林民族的敏感性

因為筆者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西北的穆斯林民族，在宗教上的議題比較容易觸及敏感的問題，因此這是筆者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比較無法碰觸的部分。另外一點是統計數據的不易取得，這也是筆者撰寫本篇論文一個很大的限制。

5. 社會文化議題的限制

因為社會文化的議題範圍太為廣泛，因此筆者無法針對所有的社會文化議題來進行分析與研究，因此在本篇論文當中筆者所討論的社會文化議題，限制在宗教、社會價值觀、傳統經濟生活、教育問題與婦女問題這幾個面向上。

第二節 相關文獻及研究概況回顧

在這一節中是針對文獻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概況做一個整理與介紹，分成下列四個部分：

一、中國伊斯蘭與穆斯林研究

伊斯蘭教從唐代開始傳入中國，就不是單純的傳入宗教，是因為商業以及政治的關係所產生的西方穆斯林向中國的移民現象，而間接的把伊斯蘭教引入中國，因此伊斯蘭教在中國產生了與其他宗教不同的族群化現象，也因為穆斯林向中國的移民是多元且分散的，從唐代到現在持續的發展各自的文化適應，造成了在中國同樣信仰伊斯蘭教卻擁有不同族群屬性的人群，在中國共產黨建政（1949年）之後，更運用政治力確認了中國穆斯林的少數民族身分，承認中國有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烏茲別克族。在這樣特殊的傳入與發展下，中國伊斯蘭教信仰與穆斯林民族的發展，可說是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這裡將針對近年來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研究概況做回顧。

李興華等人所編著的《中國伊斯蘭教史》，這本書可算是近年來研究中國伊斯蘭教歷史的一本非常完整的著作，對於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有著詳盡且客觀的分析與描述。本書從伊斯蘭教傳入中國開始陳述，全書依歷史脈落分成五大篇共二十二章，在時間上分成五個歷史時期，分別是：1. 唐宋時期 2. 成吉思汗西征—明中葉 3. 明中葉—清末 4. 民國時期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這五個歷史分期的架構下，描寫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入時間、傳播方式、以及伊斯蘭教在中國如何適應與發展。本書除了介紹伊斯蘭教的傳入與傳播歷程，還對於每個時期的穆斯林作全面性的分析，有社會地位、政治角色、藝術發展、對中國的貢獻、經濟狀況、以及宗教生活...等介紹。

葛壯所著的《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本書內容是把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發展軌跡作一個呈現，利用不同時代的歷史事件來分析中國社會與伊斯蘭教的關係，雖然不如李興華等人所編著的《中國伊斯蘭教史》來得全面與完整，但是對於整個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情形也描述的相當詳盡。

沙秋真等人所著的《伊斯蘭教歷史百問》，以及馮今源等人所著的《伊斯蘭教文化百問》分別針對伊斯蘭教的歷史與文化做問答式的解析，對於伊斯蘭教的發展與傳播、教義與思想觀念做釐清與描述。

楊懷中、余振貴主編的《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分析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與形成特點，從此書中可以了解伊斯蘭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在中國文化中所佔的地位，以及伊斯蘭教在中國的適應狀況。

楊啓辰、楊華主編的《中國穆斯林的禮儀禮俗文化》，則是詳細的論述中國的穆斯林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禮儀、禮俗的實踐，並個別分析中國境內十個穆斯

林少數民族在禮儀、禮俗上的情況，內容包括宗教功修、民居習慣、節慶風俗、商業往來等等，對於中國十個穆斯林民族的日常風俗習慣有相當完整的介紹。

而馬明良著之《伊斯蘭文化新論》，是對於伊斯蘭教的整體文化與價值體系做詳細的論述。秦惠彬所主編的《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則是將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沿革、信仰禮儀、教派、教義、經籍人物、宗教活動場域（清真寺、道堂、拱北）、經堂教育等方面，做基礎性且詳細的描述。

除了上述針對伊斯蘭教做全面式的分析與介紹的專書，還有二本針對伊斯蘭教之教派門宦問題與發展歷程的專書，這二本專都是由馬通所著：《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以及《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在《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中，探討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到如何發展出特有的教派門宦的因素與過程；而《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則是針對每個不同的門宦作分析，對於中國伊斯蘭教特有的教派門宦發展有詳實的紀錄與描述。這二本書是到目前為止最有系統分析中國伊斯蘭教的教派門宦的著作。而馬通所著的《中國西北伊斯蘭教基本特徵》，則是針對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發展與特色作論述。

關於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尚有較早期的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研究》、傳統先的《中國回教史》、白壽彝的《中國回教小史》...等。

至於穆斯林社會的研究，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採取社區式的田野調查，也頗有成果，有三本代表著作，分別是宋志斌與張同基主編的《一個回族村的當代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的《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研究叢書：回族卷：同心縣》、姚繼德與蕭芒主編的《雲南民族村寨調查：回族—通海納古鎮》。上述三本書可說是中國近年來針對中國穆斯林社群所做的一系列民族志材料，而且是有系統的以民族學研究方法為取向的回族田野民族志。⁷

而高占福所著的《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是一本探討西北穆斯林社會諸問題的論文集，內容上分成幾個部分：中國伊斯蘭教的教派門宦問題；回民起義；回族婚姻制度；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回族工作以及民國時期甘肅的回族教育；甘肅、青海等省的回族商業經濟；回族近現代人物等。

楊文炯所著之《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是以西北四個回族聚居的城市（蘭州、西安、銀川、西寧）為研究區域，針對回族穆斯林的都市少數民族現象與現況做分析探討。

除了上述大陸學者的相關研究之外，美國學者杜磊（Dru C. Gladney）所撰寫的《中國穆斯林》（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探討中國穆斯林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其中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別是對中國四個不同的回族社區（納加戶、牛街、長營、陳埭）的民族志之描述，也是本書的重點，也因為杜磊對於中國穆斯林的社區有過田野調查，使筆者在做循化撒拉族的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能夠對於中國穆斯林民族的現狀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於筆者在問題意識的掌握上也有所幫助。

⁷ 張中復，〈回族現象觀察的「點」與「面」—從三本回族調查資料的研究取向談起〉，《回族研究》，銀川：寧夏社會科學院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所，2003年第2期，頁60。

台灣學者張中復所著之《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認為西北的伊斯蘭教門宦現象與回民事變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並提出清代西北的回變對當代西北以回族為主的穆斯林而言，在民族認同與民族凝聚力上頗具影響。

二、民族經濟研究

中國因為改革開放，致力於發展經濟，一九七九年後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開展出新的學門，不過在民族經濟學的領域中，中國學界主要的焦點是放在如何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跟上發展的腳步，如何使少數民族的經濟能夠脫貧致富，而針對於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特性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研究，可說是鳳毛菱角，相當的缺乏。

施正一著之《民族經濟學和民族地區的四個現代化》，算是中國第一本關注民族經濟的專書，而少數民族經濟之所以會被重視，主要是因為在中國走向經濟改革的方向之後，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也必須要有所提升，因此中國學界對於民族經濟的研究，從這本書開始多是針對如何提升少數民族經濟水準為關注焦點。

陳慶德著之《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開發概論》，以及黃萬綸、李文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新論》，同樣是分析如何讓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能夠發達的專書，並且提出建議與對策，與施政一的論點相似，都是用策略性的角度來探討民族經濟的議題。

近年來關於民族經濟理論方面的著述，還有另一本施正一所主編的《民族經濟學教程》，雖然本書是一本給研究生閱讀的教材，但是除了全面分析中國少數民族的經濟問題，還擴大視野論述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民族經濟問題與差異，與以往民族經濟論述相比，在研究對象與方向上都呈現更寬廣的面貌。

黃健英、薩茹拉、朱錦峰等著之《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戰略》，在撰寫目的上就是探討如何促使少數民族經濟發展之計畫與策略，但是在內容上，除了關心民族經濟該如何突破，還關注到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認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脫離不了特殊的文化、宗教的影響，認為這些非經濟因素對於經濟發展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提出若要發展經濟，便必須拓寬視野，從民族文化著手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民族經濟發展的問題與未來。

而阿爾丁夫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研究》，是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鄉鎮企業做研究，本書有系統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還實地考察少數民族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狀況，並分析目前少數民族在發展鄉鎮企業時所面臨的問題，可說是學界唯一一本對少數民族鄉鎮企業深入探討的專書。

從這幾本民族經濟學研究的專書看來，早期對於民族經濟的關注，往往僅限

於研究如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但是近幾年來，對於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也開始有所重視。

三、伊斯蘭教經濟研究

近年來穆斯林研究蓬勃發展，關於伊斯蘭教的經濟思想與制度的研究也逐年增加。在專書部份有張永慶、馬平、劉天明著之《伊斯蘭教與經濟》，本書認為伊斯蘭教與經濟的關係是在伊斯蘭研究中相當重要的領域，本書試圖探討伊斯蘭教的思想與制度、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如何適應的問題，是一本全面分析伊斯蘭教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專書。

劉天明所著之《伊斯蘭經濟思想》，是一本專門探討伊斯蘭教經濟思想的專書，內容從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一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伊斯蘭教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以及基本內涵，都有所探討與分析。

除了上述兩本專書外，南文淵所寫的〈伊斯蘭教對回族、撒拉族穆斯林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及馬明良〈伊斯蘭教與撒拉族經濟〉，都是收錄於《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均關注到宗教所影響的文化價值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在中國學界較少學者關心宗教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這方面的相關問題，這也是筆者在撰寫本論文時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

四、撒拉族研究

中國在五〇年代大規模的對各少數民族做社會歷史調查，對撒拉族的調查是一九五八年進行的，於一九六三年內部鉛印成《撒拉族簡史簡志合編》，撒拉族的研究，可說是由此開展。⁸但是到一九八五年才正式出版《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薩克族社會歷史調查》。

關於撒拉族的歷史專書，均為芊一之教授所編著，有《撒拉族簡史》、《撒拉族政治社會史》、以及二〇〇四年新出版的《撒拉族史》。芊一之教授致力於研究撒拉族已經半個世紀，《撒拉族史》一書可說是他窮畢生之力所撰寫最完整詳盡的撒拉族史專書，內容從考證撒拉族族源，到不同朝代的撒拉族發展，以及撒拉族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分析探討。

何星亮主編之《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與陳雲芳、樊祥森著《撒拉族》，以及馬成駿、馬學義編著之《撒拉族風俗志》，這三本書的研究成果相近，對於撒拉族的民族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論述都呈現相似的面貌。

⁸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頁4。

馬成俊主編的《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是近年來針對撒拉族社會經濟發展做完整深入分析的專書，本書除了分析撒拉族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的特色之外，還對於撒拉族的社會文化與經濟面臨的適應問題作分析探討。

韓建業所著之《撒拉族語言文化論》，試圖從撒拉族的語言來分析撒拉族的文化特徵與民族關係，進而企圖考證撒拉族的族源與歷史，這也是近年來研究撒拉族文化與遷徙歷程的新的發展趨勢。

除了專書以外，關於撒拉族經濟文化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也有多篇期刊論文，對於撒拉族先民的經濟研究有馬維勝的〈撒拉族先民經濟文化分析〉，而馬偉、馬曉軍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張愛儒的〈對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發展鄉鎮企業的對策研究〉，是針對循化自治縣個體經濟發展作研究。而馬明良的〈撒拉族生產觀念與生產實踐〉、馬維勝的〈撒拉族商業略述〉和〈撒拉族鄉鎮企業中的家族化現象及其改造〉、南文淵的〈伊斯蘭教對回族、撒拉族穆斯林經商行為的影響〉、堅燁的〈發揚優秀傳統克服消極因素——淺談撒拉族傳統文化與經濟建設〉等期刊論文，則是從撒拉族本身的價值觀念體系、傳統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等，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撒拉族的經濟，探討撒拉族在社會經濟方面發展的特色。

而馬成俊與馬偉共同主編的《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於二〇〇四年出版，收錄了從一九三〇年至今研究撒拉族的期刊論文的論文集，對於撒拉族的研究有很深的意義，因為撒拉族研究始於三〇年代的歷史學者發表的關於撒拉族歷史研究的論文，至五〇年代因為中國民族識別的因素而使學界對於撒拉族有更多的關注，但是這些期刊論文始終是散落在各處，而今這本論文集的出版，不但提供讀者撒拉族研究比較全面性的介紹，也讓撒拉族的研究史有更完整的呈現。

第三節 撒拉族與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概況

一、撒拉族概況

(一) 族稱與族源

撒拉族自稱“Salar”，在漢文史集中有許多不同的漢語譯音。在芊一之教授著之《撒拉族史》一書中，對於撒拉族的族稱在第一章第一節就先做釐清：「撒拉族自稱“撒拉爾”（Salar），周圍漢、藏、回等族稱之為“撒拉”。……漢文譯名在史集中出現的有十多種。……如：《元史·百官志》稱“撒刺”，《新元史·氏族表》稱“撒刺兒”。明代時仍是這樣記載，《明永樂實錄》卷一二一稱其為“撒刺”，《明宣德實錄》卷一八稱“沙刺簇”；明中葉後，張雨《邊政考》稱“撒刺”，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九稱“撒刺”。清初，黃冊檔康熙《陝西土官番人姓名馬匹茶籠數目文冊》稱“撒刺”，康熙《河州志》則稱爲“撒喇”，乾隆時《清高宗實錄》中則稱作“薩拉”、“薩拉兒”、“撒拉兒”，乾隆《循化志》卷四中稱“撒喇”，或稱“撒拉回子”等。……“撒拉爾”一詞的意義，在波斯語中有“領兵官”、“領兵統帥”之義。一些撒拉族老人和撒拉地區的大阿訇也有這樣的說法。在突厥語中，則有黃色、黃頭的意思」。⁹

從史料看來撒拉族的自稱與他稱基本上都是“Salar”譯音，不過漢文的族稱則是直到一九五四年中國進行民族識別之後，才正式定名為撒拉族。

撒拉族因爲沒有本民族文字，因此在歷史紀錄上，只能參考他民族的文字或是當時的政權所留下來的歷史資料，但是漢文史料中並沒有清楚說明撒拉族的民族來源，導致長期以來關於撒拉族的族源問題有許多種說法。在沒有本民族文字的狀況下，撒拉族對於自己的祖先來源也有口耳相傳的族源傳說，過去在撒拉族的婚禮中會表演“駱駝戲”，其內容就是追述撒拉族先民從中亞撒馬爾罕遷來循化的經過，在芊一之教授著之《撒拉族史》裡有紀錄這個族源故事：¹⁰

從前中亞撒馬爾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哈莽兄弟二人，在伊斯蘭教門中很有名望。由於他們反對壓迫，遭到國王的嫉恨和迫害。一天，國王派人偷來一頭牛並宰殺來吃，之後把牛頭和牛蹄等包在牛皮裡，偷偷的放在尕勒莽的屋頂上。接著，牛主人便去告狀，國王一本正經的到處搜查，最後在尕勒莽屋頂上查獲牛頭等物。尕勒莽如此被判了死刑，在行刑前，尕勒莽在公堂上當著許多百姓請求允許他念經，經唸完之後，在真主的默佑下，國王當場變成了一個怪物，尕勒莽的性命就此保了下來，真相也大白。但是尕勒莽認為此地不宜再居住下去，放棄了家產，跟阿哈莽連同族屬共 18 人，牽了一峰白色駱駝，駝著《古蘭經》便要東

⁹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3。

¹⁰ 同前註，頁 5-8。

行。出發前，當地一位“外利”¹¹教他們帶上故鄉的土和水，並告訴他們：哪裡的水土質量與這裡的相同，哪裡就是應該居住的樂園。尕勒莽等人離開撒馬爾罕在路上行走了17個月，他們一路經過天山北路，吐魯番，進嘉峪關，經肅州、甘州、涼州，又到寧夏。在東南行到了秦州（天水），折而西返，到伏羌（甘谷），又到洮州（臨潭）、黑錯（合作），經拉卜楞，進入夏河縣的甘家灘。尕勒莽等人離開撒馬爾罕後又有45人隨後追隨而來，經天山南路入青海境內，沿著青海湖南岸東行。他們先到貴德、走尖扎灘，又到同仁後折到元珠溝。因為已經相當疲憊，有12人就留在元珠溝，以後繁衍成元珠溝十二族。¹²其餘的33人繼續東行，在甘家灘與尕勒莽18人巧遇。尕勒莽等51人牽著白駱駝從甘家灘朝西北行，進入循化的夕廠（夕昌）溝，又跨越孟達山，上了奧土斯山，這時天色昏暗，白駱駝在昏暗中走失，大家便四處找尋，在曙色中展望街子一帶，放眼望去土地平行，清流縱貫，下坡之後發現一泓泉水，清澈見底，而走失的白駱駝就臥在泉水中不起，尕勒莽用木棍去搗駱駝促使起之，不料，駱駝變成了白石，木棍變成一株常青樹。眾人想起外利的話，把家鄉的土與水拿出與泉水和附近的土相比較，質量完全相同，於是就決定在此生活。

上述的傳說故事，基本上提供一個線索，就是撒拉族不是循化當地的原生民族，是從外地遷徙而來，但是究竟是何時遷入？為何路經許多地方又折返？而當時在撒馬爾罕的國王是誰？尕勒莽與阿哈莽兩人又是什麼身分？這些關鍵問題在傳說中都沒有提供解釋，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陸一些學者試圖從史料中找出撒拉族的真正來源與遷徙過程。

有一派的說法是，撒拉族先民是中亞撒馬爾罕地方烏古斯人的一個支系—撒魯爾人，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亞之後，將中亞當地的人民組成“西域親軍”，撒拉族的先民便是“西域親軍”中的“撒兒特”部。等到成吉思汗在西元一二二五年至一二二七年從中亞返回的時候，“撒兒特”部就隨軍轉戰至青海循化地區，並屯駐在此。¹³也有學者認為撒拉族的祖先，是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亞後，被下令強迫東遷的穆斯林民族之一，並不是出於自願的從中亞東遷至現今的循化地區定居。¹⁴

目前學界對於撒拉族的族源的看法大致為，撒拉族的祖先是烏古斯部，是屬於西突厥人中的“黃頭突厥”或“黃姓突厥”。至成吉思汗征服突厥各部後，撒拉族之祖先無疑也臣服於蒙古，隨著蒙古大軍各處征討並隨後定居於今青海循

¹¹ 就是“阿林”，伊斯蘭學者的統稱。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頁430。

¹² 元珠溝十二族，風俗習慣完全藏化。參考：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7。

¹³ 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542。

¹⁴ 芊一之著，《撒拉族政治社會史》，香港：黃河文化出版社，1990，頁16。

化。

(二) 語言

撒拉族沒有本民族文字，而本民族的語言—撒拉語，與其聚居地區周圍民族所使用的藏語、漢語循化方言無論在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上都不相同，撒拉語是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與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塔塔爾語等語言，是屬同一個語支，¹⁵在語言型態上屬於黏著語。

撒拉語的語言內部比較一致，沒有明顯的方言區別，但是因為各地語彙、語音、語法的習慣不同，就區分成“街子土語”和“孟達土語”兩種。“街子土語”主要由循化縣的蘇只、街子、清水、白庄及化隆縣的甘都等地撒拉族所使用；“孟達土語”則是由循化縣的孟達大庄、木廠、它撒坡的撒拉族使用。¹⁶

(三) 宗教信仰

撒拉族信奉伊斯蘭教，是中國十個穆斯林民族之一，而且撒拉族早在從中亞東遷至循化之前，就已經信奉伊斯蘭教，這一點在撒拉族的族源傳說“駱駝馱經”中也有證明。¹⁷伊斯蘭教的教義思想，也成為撒拉族的核心價值，以及民族內部強而有力的凝聚力量。

撒拉族遵循伊斯蘭教法規，信仰虔誠，還曾實行“尕最”¹⁸掌教的制度，在教法官掌教制度下，還實行“三長制”¹⁹和“三級寺院制”，²⁰因為如此，撒拉族的宗教制度曾與土司制度做結合，成為統治人民的工具。²¹不過在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變”撒拉族反清失敗後，清廷廢除了“土司”制度、“尕最”制度與“三長制”等制度。此後撒拉族的宗教制度與其他穆斯林無異，不再有世襲制的領導人。

¹⁵ 郝蘇民主編，《絲路走廊的報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型態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頁142。

¹⁶ 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546。

¹⁷ 同前註，頁567。

¹⁸ 即宗教法官之意，負責執行伊斯蘭教法，監督所屬教民遵守宗教規儀。在撒拉族曾實行的“尕最”制度是世襲制，撒拉族的“尕最”姓韓，與土司同姓。參考：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123-126。

¹⁹ 與“尕最”制度一樣是世襲制，三長分別是1.伊麻目一人，負責講經的阿訇。2.海依一人，負責領念以及做“呼圖拜”的阿訇。3.阿提布一人，是負責帶領眾人念經的阿訇。參考：馬成俊、馬學義編著，《撒拉族風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頁96-97。並參考：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123-126。

²⁰ 即實行總寺、宗寺、支寺的管理組織制度。在清代，撒拉族地區只有一個總寺，即街子工清真大寺，在光緒二十一年之前為世襲總教長(尕最)所居。“宗寺”則是撒拉族地區每一工就有一個宗寺，“工”是撒拉族特有的社會組織名稱，意思為村鎮，等同於鄉一級的行政單位。“支寺”則是各村的清真寺。參考：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569。

²¹ 同前註，頁569-570。

一般研究者都認同撒拉族的宗教信仰屬於遜尼派的大伊瑪目派，即哈乃斐派，²²但是芊一之教授卻認為，實際上撒拉族的宗教信仰受波斯來的什葉派影響頗大，例如：撒拉族曾經實行過的“尕最”制度，就是受到相當程度什葉派的影響，²³而這樣的“尕最”宗教制度對撒拉族的影響，以及芊一之教授認為的什葉派的宗教思想對於撒拉族的文化、政治、社會所產生的作用，是筆者認為對於研究撒拉族的族源與民族特性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之一。

（四）社會組織結構

「家庭」是撒拉族的基本組織，撒拉族為父系家庭制，其主權操縱在男子手中。²⁴「阿格乃」，²⁵是撒拉語“aka-ini”的譯音，為兄弟之意，一般是在父系血緣關係上形成，大多由兄弟各自成家之後的小家庭組成，包含的戶數由二到二十戶不等。阿格乃一般居住在同一地區，在生產和生活上相互幫助，彼此關係密切。「孔木散」，²⁶是撒拉語“kumsen”的譯音，在撒拉語裡是“一個根子”的意思，一般由若干個有血緣關係的「阿格乃」組成，也就是遠親之意。「孔木散」自成居住區域，有公共墓地，在生產和生活方面有互助習慣，在撒拉族早期應該等同於氏族組織。「阿格勒」，是撒拉語“agil”的譯音，是村莊的意思，是個地緣組織，而不是像阿格乃與孔木散一樣的親屬組織。每個阿格勒由若干個孔木散組織而成，有些孔木散有血緣關係，有些則沒有。最突出的特徵是每個阿格勒都有一座公共的清真寺，²⁷這就是“支寺”。

「工」，是撒拉族特有的社會組織名稱，意為“村鎮”。²⁸由若干個阿格勒所組成，相當於鄉級的社會行政機構。撒拉族居住地區建立有「工」的基層組織，是從清雍正八年（1730年）因為征桌子山，始分撒拉十二工，²⁹之前並無「工」的行政單位。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蘇四十三領導的反清事變失敗後，因人口大減，遂十二工改為八工，以循化縣城為中心，城以西為上四工（街子工、查家工、蘇只工、查漢大寺工），城以東為下四工（清水工、孟達工、張哈工、夕廠工），合稱“撒拉八工”，也稱“內八工”。而遷居到化隆境內的撒拉族居住區，也分為五個工（甘都工、卡力崗工、上水地工、黑城子工、十五會工），

²² 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 567-568。

²³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123。

²⁴ 馬成俊、馬學義編著，《撒拉族風俗志》，頁 1。

²⁵ 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 551-552。

²⁶ 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295-296。並參考：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 552。

²⁷ 同前註，頁 552-553。

²⁸ 同前註，頁 553。

²⁹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734-735。

也稱“外五工”，因此有“撒拉內八工外五工”的說法，總稱之為“撒拉十三工”。³⁰不過「工」的組織，已經於民國時期改制，目前在行政區劃上已經被「鄉」所取代。

（五）傳統經濟生活

撒拉族的傳統經濟，經歷了一個從牧業為主到農業為主的過程。撒拉族先民西突厥人在歷史上主要就是從事畜牧業，不過經濟生活本來就是呈現動態發展，在中亞撒馬爾罕的撒魯爾人，也因為自然條件而有發展農業耕作，在遷居至循化定居之後，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之下，撒拉族也逐漸發展出較精緻的農業文化。下面就撒拉族的傳統經濟分類說明：

1. 農業與園藝業

據芊一之所著《撒拉族史》中提到：「據撒拉族人說，撒拉族祖先從撒馬爾罕帶來黑麥芒和白麥芒的種子，長期以來種植麥類作物」，但是芊一之教授認為撒拉族種植麥類作物是受到藏族的影響。³¹除種植麥類作物小麥、青稞、蕎麥以外，還有豌豆和洋芋等糧食作物。另外還種植油菜、胡麻、各類蔬菜（白菜、雪裡紅、大頭菜、菠菜、芹菜、洋蔥、韭菜...等等）。其中有一種紅辣椒，俗稱“線辣”，具有色紅、肉厚、味香而不辣、耐儲存等特點，是循化縣近年來最重要的經濟作物。³²

除了農業之外，園藝業也是撒拉族傳統經濟生活的一大特色，每個村莊都有共同的果園。據《循化志》記載，撒拉族的蔬菜水果是相當豐富的：「蔬菜則本城皆有.....白菜多而佳.....」，還記載：「果則桃、杏、蘋果、櫻桃、林榛、棗子。葡萄佳，核桃尤佳。」，³³由此可知，在清代時撒拉族人的園藝就已經發展的很好了。

2. 牧業

畜牧業在撒拉族的經濟生活中一直都佔有重要的地位，直到清乾隆期，對畜牧業賴以維生的草山十分重視，還為此發生爭奪草山事件。《循化志》記載撒拉各工最西邊的查汗大寺工與湯思剛庄番人爭奪草山發生械鬥；³⁴在《循化志》中也記載撒拉族畜牧業所飼養的牲畜種類：「畜則犏牛，.....羊則綿羊而尾小。馬、狗、雞，俱與內地同。」³⁵

直至今日，雖然畜牧業對撒拉族來說已經不是主要賴以維生的經濟活動，但是農村裡各家各戶基本上仍然會畜養少數的牲畜與家禽，這已經成

³⁰ 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88、733-734。

³¹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66-78。

³²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188-194。

³³ (清)，鞏景瀚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七，頁 167。

³⁴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74。

³⁵ (清)，鞏景瀚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卷七，頁 168。

為撒拉族農業生活的一部分。

3. 手工業與副業

在撒拉族的經濟生活中，手工業主要是從事牛絨的處理以及傳統服飾的刺繡，不過手工業的經濟效益在傳統的撒拉族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多半都是在家中的婦女自己因為生活所需而做的；而撒拉族主要的副業有打獵、伐木和淘金。打獵、伐木與淘金會發展成為副業，主要是在農地很少的孟達鄉，因為孟達鄉地形坡大谷深，加上土地貧瘠，因此農業與牧業在此地無法有良好的發展，再加上孟達緊鄰黃河，黃河上游河灘沙石中含有沙金，因此孟達地區以淘金為副業的人為數不少。³⁶

（六）習俗

撒拉族的習俗多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與回族有相當多的相似處，但也有一部分是撒拉族本民族的特色：

1. 飲食

撒拉族的主食以小麥為主，以蕎麥、洋芋、青稞為輔。主食通常做成饅頭、烙餅、麵條、面片、拉麵等。副食主要是牛羊肉，也吃雞、鴨、兔和魚肉，但因為數量較少並不常食用。撒拉族喜歡喝茶，奶茶、蓋碗茶、伏茶、麥茶都有，其中以蓋碗茶為上品，尤其在家中有客人時會以蓋碗茶招待客人。³⁷

2. 居住

一般都以血緣較近的「阿格乃」、「孔木散」居住在同一區域，住房多是平頂的土木結構房子，家屋一般由堂屋、廂房、灶房、圈房所組成，中間有一個用磚砌成的圓形或正方形的花圃，每院房屋四周均用土牆圍起來，形成一家一院的樣貌。八〇年代以後，因為經濟發展較好的緣故，使許多富裕的撒拉族在修房子時使用上好的木料，屋面雕上花槽，牆上貼瓷磚，有些還會建起新式的樓房。³⁸

3. 婚姻

撒拉族婚制主要為一夫一妻制，並實行嚴格的外婚制，同一「阿格乃」（家族）內的男女嚴禁通婚。有早婚的習俗，女九歲、男十二歲便承擔了婚嫁的“非爾則”（神聖的天命），³⁹一般撒拉族少女長到十四歲左右

³⁶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75-77。

³⁷ 陳雲芳、樊祥森著，《撒拉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 65-67。

³⁸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767。

³⁹ 馬成俊、馬學義編著，《撒拉族風俗志》，頁 24。

就待在家中，等待父母為其主持婚事，直到今日在循化地區的撒拉族仍有這樣的習俗，婚姻多是媒妁之言、父母包辦。在婚姻關係中，男性掌握主導權，擁有“口喚”⁴⁰離婚的權力，如果男方對妻子說三聲“我不要你了”，那麼就算是宣布離婚。但是女性無此權力，女性若想離婚但是沒有得到男方的“口喚”，是不可能離婚的。⁴¹

4. 節慶

撒拉族的節日與一般穆斯林民族一樣主要過三大節日：爾德節（開齋節）、古爾邦節（宰牲節）和聖紀節。

爾德節：每年伊斯蘭教曆九月為齋戒月，齋月中每日拂曉至日落禁止飲食，齋月最後一天尋看新月，見月開齋。開齋節當天婦女會準備豐盛的飲食，男性會舉行禮拜，禮拜結束後，人們會相互到親朋好友家拜節，而各家也會準備豐盛的飲食來招待客人，約三日結束。

古爾邦節：於伊斯蘭教曆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朝覲的最後一天舉行，每年的這一天宰牲獻祭，有時宰牛、有時宰羊，人們會互相分享肉品，節日一般也是過三天。

聖紀節：伊斯蘭教曆三月十二日舉行。紀念穆罕默德的生日與忌日，爾德節與古爾邦皆只允許男性做禮拜，但聖紀節則是男女均可前去做禮拜。

撒拉族除了過上述三個節日以外，就是在齋月的第十二天會過“法圖麥節”，紀念穆罕默德的女兒法圖麥。一般是由成年婦女參加。⁴²而這個節日大部分的中國其他穆斯林民族是不過的。這一點是撒拉族與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差異。也是學者芊一之會認為撒拉族在教派上應該不是單純的遜尼派的因素之一，不過這一點學界尚未有更多的研究。

（七）人口分布

撒拉族主要有三個聚居區：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化隆回族自治縣的甘都鎮、以及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下面將簡稱為循化縣、化隆縣和積石山縣）。而撒拉族的這三個主要聚居區，都是在黃河沿岸，相互比鄰。

撒拉族的人口數，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顯示，全國的撒拉族人口是 104,503 人，在青海省則有 87,043 人，循化縣的撒拉族人口是 63,859 人，化隆縣的撒拉族人口是 11,100 人；甘肅省有 11,784 人，積石山縣有 9,342 人。從上面這些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統計數據可以知道，撒拉族人口多數集中

⁴⁰ 伊斯蘭教用語，為許可、命令之意。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296。

⁴¹ 何星亮主編，《中華文化通志（維吾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俄羅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頁 556。

⁴² 芊一之著，《撒拉族史》，頁 118。

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也就是說循化縣是目前撒拉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佔了全中國撒拉族人口的 61%。⁴³

二、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概況

(一) 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⁴⁴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循化縣），位於青海省東部，屬於青海省海東地區，祁連山支脈拉雞山東端，黃河由西向東橫貫循化縣境北部。地理位置介於東經 102°04′~102°49′、北緯 35°25′~35°56′之間。東西長六十八公里，南北寬五十七公里，總面積二千一百平方公里。東與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及臨夏縣接壤，南臨甘肅省夏河縣和青海省同仁縣，西邊與青海省尖扎縣，北與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為鄰，東北與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相連。

循化縣地處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帶，氣候上，屬於高原大陸性氣候，特點是：氣候溫和，夏無酷暑，且日照時間長，太陽輻射強，但降雨量較少；地形上，四面環山，山谷相間，南高北低，海拔在 1780 公尺~4635 公尺之間，黃河寬谷地帶向南海拔越高，地形、氣候之垂直差異明顯，依據地表型態可分四種：

1. 河谷地區

這個地區俗稱川水地區，海拔在 1840~2200 公尺之間。佔全縣總面積的 17.5%。地勢較平坦，土質肥沃，氣候溫和，是糧食和水果蔬菜的主要產區。

2. 中東部中低山

這個地區俗稱淺山地區，海拔在 2200~3200 公尺之間。佔全縣總面積的 40.2%，此處多為耕地。

3. 中西部中高山

這個地區俗稱腦山地區，海拔在 2200~4100 公尺之間。佔全縣總面積 23.1%，植被較好，是天然次生林區，適宜種植耐寒植物，是農牧業混合區。

4. 南部高山

這個地區位於縣境東南部的高山地帶，海拔在 3600~4635 公尺之間，

⁴³ 參考：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統計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上冊）》，頁 2-3、18。並參考：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統計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下冊）》，頁 1186。

⁴⁴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85、116-117、120-121。

地形山巒起伏，佔全縣總面積的 19.2%，區內多為草山地區，適宜發展畜牧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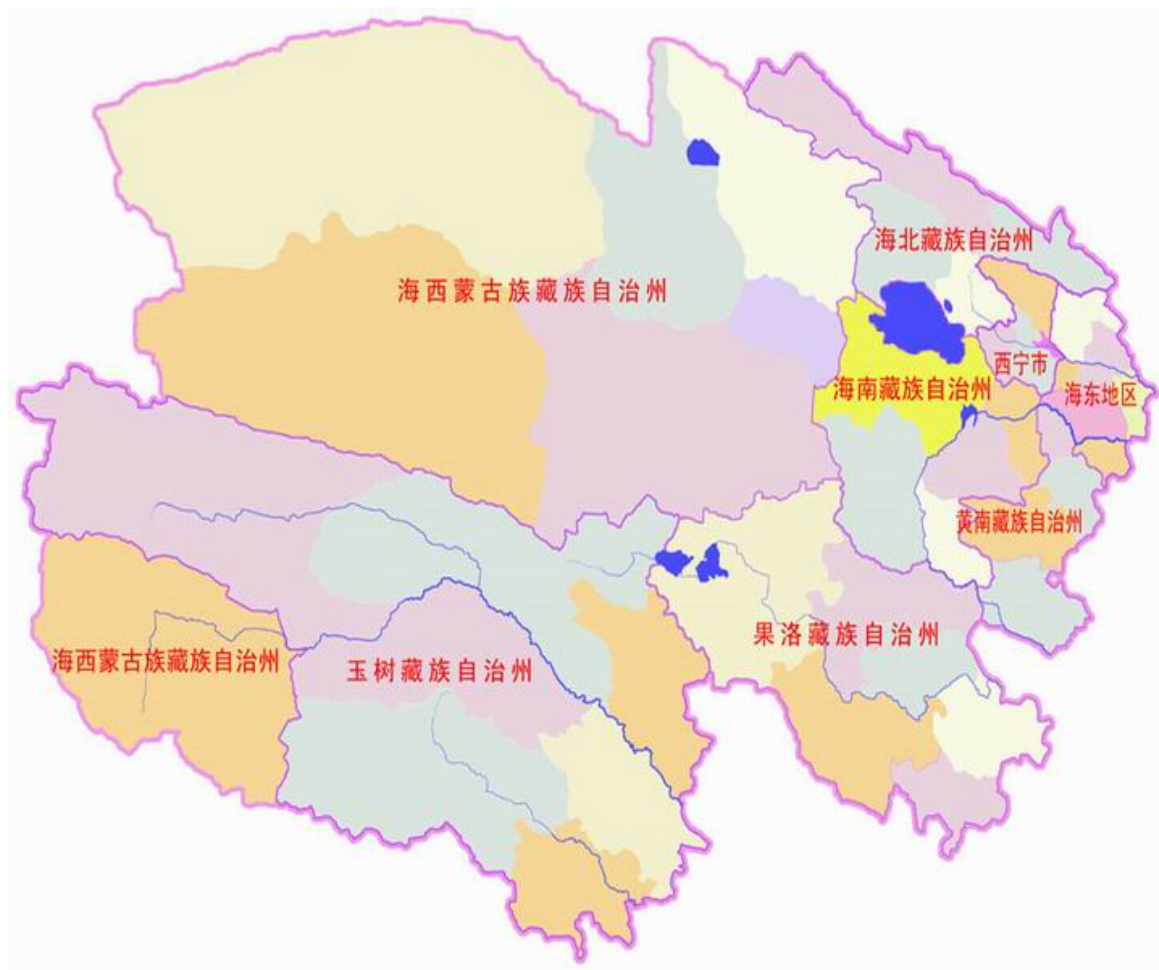


圖 1：青海省地圖

資料來源：青海青網站<http://www.qhphoto.com/dl/dzdt/dz.htm>

查詢日期：2006 年 5 月 29 日

（二）行政區劃⁴⁵

循化縣於一九五四年三月成立為循化撒拉族自治區，次年改為自治縣，目前行政區劃一鎮九鄉是一九八四年才確立的，之前是採人民公社制度，在此不多加贅述。

現今循化縣下轄一鎮九鄉，分別是積石鎮（為縣府所在地）、白庄鄉、清水鄉、孟達鄉、街子鄉、查汗都斯鄉（原為查汗大寺）、道幃鄉、文都鄉、尕楞鄉、

⁴⁵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90-92。

崗察鄉。



圖 2：青海省海東地區地圖

資料來源：青海青網站 http://www.qhphoto.com/dl/DZDT/PAGE_203.HTM

查詢日期：2006 年 5 月 29 日

(三) 民族與人口分布⁴⁶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內總人口數，在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是 104,452 人，其中循化縣內除了總人口 61% 的撒拉族之外，還有藏族 25,783 人、回族 8,155 人、漢族 6,217 人。

⁴⁶ 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志》，頁 92。

撒拉族、漢族與回族主要分布在積石鎮、白庄鄉、清水鄉、孟達鄉、街子鄉、查汗都斯鄉等地；而藏族主要居住在道幃鄉、文都鄉、尕楞鄉、崗察鄉等四鄉。

第四節 撒拉族鄉鎮企業的概念及其發展歷程

一、撒拉族鄉鎮企業名詞解釋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撒拉族鄉鎮企業，而本論文所指稱的撒拉族鄉鎮企業此一名詞之意涵，就是撒拉族人所辦的、經營的私人民辦企業。鄉鎮企業這個名詞按中國現行統計分類包括：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聯戶企業、個體企業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企業，有些地區還有隊辦和組辦企業，⁴⁷廣義來看，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只要不是國營企業，就屬於鄉鎮企業的範圍，也就屬於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二、撒拉族鄉鎮企業發展歷程概況

鄉鎮企業的發展就整個中國來說是八〇年代以來的事情，循化縣的撒拉族鄉鎮企業也不例外，不過循化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自古就是茶馬貿易中心地之一，就整個經濟發展而言，有其歷史背景，因此在本節中將對於循化縣撒拉族發展鄉鎮企業的歷程與概況做說明，從整個發展過程來看，共分三個階段：

（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農村副業”時期：

循化地區位於黃河上游，是農牧兩大經濟區域的結合交會處，而且地處於西寧—臨夏—蘭州這條歷史古道的必經之路，在歷史上就有商業貿易的背景。《循化志》卷四中記載：「循化舊為河州廳專斯茶馬」；⁴⁸乾隆年間還記載：「私販盛而商茶壅，國課難完，故緝禁之文，歲歲不絕，而終不能禁，近年以來，無地無私茶。」⁴⁹由此可見當時循化的商業貿易之盛行。

到了近代，民國時期馬步芳在青海開設了許多商號，也都啓用了許多撒拉族商人，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循化已經形成街子、白庄有 40% 以上的農戶做小生意的情況。⁵⁰

（二）一九五八～一九八〇年間的“社隊企業”時期：

隨著社會發展的變遷，循化地區在一九五三年以後也開始興辦起社隊企業，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因素，使得本來就缺乏發展條件的社隊企業受到阻

⁴⁷ 威廉·伯德、林青松編，《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結構，發展與改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1。

⁴⁸ (清)，鞏景瀚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廳志》，卷四，頁 80。

⁴⁹ 同前註，卷七，頁 162。

⁵⁰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92-93。

礙。不過因為社隊企業的興辦，也替之後的鄉鎮企業打下了一點發展的基礎。

（三）一九八〇年後的鄉鎮企業：

這一時期的循化經濟，因為原本的農村副業的底子，以及擺脫了社隊企業的徘徊不前之局面，開始進入鄉鎮企業發展的階段。八〇年代後，農村的改革使得鄉鎮企業獲得發展的契機，使原本被集體化掩蓋的剩餘勞動力向非農業尋找出路，在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間，貨幣金融的環境比較放鬆，鄉鎮企業容易獲得銀行的資助，到一九八五年，循化的鄉鎮企業發展加快，企業數由一九八四年的533個增加到823個；“八五”（1991~1995年）期間，鄉鎮企業被縣委縣政府作為重點來全力推動，鄉鎮企業數量在一九九五年底發展至1,295個，年產值達到百萬的企業約三十家，年產值上千萬的有二家，絨毛加工業在此一時期嶄露頭角；到“九五”（1996~2000年）期間，由原來企業數量快速增加的階段進入到企業質量發展的階段，循化的“雪舟三絨”集團合併了循化其他絨毛加工企業，並使得循化縣成為全青海省最大的犛牛絨加工集散地。⁵¹

本節在上述介紹了循化撒拉族從中共建政後的經濟發展歷程，這三個歷史階段可概況式的看出循化撒拉族在發展鄉鎮企業的背景與過程，接下來將於下一章中，針對鄉鎮企業在整體中國社會下的發展過程作介紹，並更進一步釐清西北甘、寧、青三省區穆斯林鄉鎮企業的發展特色，以及介紹循化撒拉族鄉鎮企業發展的現況。

⁵¹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95-97。